

早年的生活

日、中、加三國教育

日本

郭惠二先生七歲進入日本小學就讀。因為是中國人，加上才大病初癒，體力差，所以經常受到同學的欺負，也交不到朋友。四年級的時候，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太平洋戰爭中節節失利，本島更遭受盟軍的轟炸，年幼的他被迫和學校一起疏散到鄉下，離開東京的父母，也因此失學一年。

台灣

大戰結束後，跟著父母回到台灣。他的父親到中山教會牧會，這時，他雖然已經十二歲，國小六年級，但因不諳國語和台語，體力差，個性又內向，在班上都常受到同學的排擠，孤獨的他轉而以琴為伴，專心學習。十四歲時，就開始在教會擔任司琴的工作。

他是在國中一、二年級時的一場佈道會中決志信主。那場佈道會由芝加哥浸信會牧師 Dr. Harris 主講。Dr. Harris 和路經

新加坡美籍牧師 Dr. McCoy 不約而同地來到台灣，因為他們同時在兩地(美國及新加坡)得到神的指示，要他們來台灣告知蔣中正總統：台灣將不會有危險(那時是民國三十八年)，但是神要他認罪悔改，因他在大陸所做的許多神看為惡的事。據兩位牧師的見證，蔣總統非常地感動，在兩位牧師面前流淚向神認罪悔改。

郭惠二先生在中學時代就喜歡閱讀日文書籍，他當時曾讀過一篇有關一對瑞士青年到非洲服事神的故事：太太原是瑞士大銀行家的女兒，但父母仍允許她嫁給年輕的傳道人。在非洲宣教當地，他們生了一個女兒，一家人和樂地生活在一起。可是好景不常，在一次瘟疫中，他們失去了愛女，他們將她葬在非洲的土地裡，並在上面種了一棵樹。但是不久之後，他心愛的妻子也因瘟疫去世，這位年輕的傳道人在野地裡哭了許久，最後將妻子葬在女兒旁邊。墳上的樹漸漸長成了大樹，這位傳道人沒有再婚，

出生背景

郭惠二先生出生於基督徒世家，祖父郭希信牧師是台灣第一代的基督徒，也是台灣北部第一位加拿大宣教師馬偕 (Rev. Dr. George Lesley Mackay) 的得意門生。馬偕牧師就是馬偕紀念醫院的前身—馬偕醫院的創辦者，郭希信牧師後來成為台灣早期知名的牧師。郭牧師有四個兒子和二個女兒，雖然早期牧師家都很窮，但因神的恩典，六個兒女中竟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期中接受了大學教育，其中又以郭惠二先生的父親，郭馬西牧師最為出色。

郭馬西牧師在第一次大戰結束那年，經日本政府甄選以公費留學美國七年，先後在紐約協和神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研修神學，成為台灣長老教會第一位擁有外國學位的本地牧師，與名佈道家宋尚節博士在協和神學院是

同學。郭惠二先生的母親葉水樹女士是當時台南首富的女兒，也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他在家中排行第四，上有一個哥哥、二個姊姊，下有三個弟弟及二個妹妹。郭馬西牧師面對衆多的兒女，正如一般的父母，他偏愛長相像自己的惠二，而他也認為惠二將是他傳道事業的繼承人。

郭惠二先生出生後十天，就因父親工作的關係，全家乘船渡海，遠赴日本。郭馬西牧師在日本的工作是照顧台灣旅日的留學生，因為必須經常到各地探訪，幼年的郭惠二先生隨著父母四處旅行，幼小的心靈得以不斷地受到啓發，為他日後廣泛的興趣撒下了種子。他五到七歲時曾罹患嚴重的肺炎，好幾次瀕臨死亡的邊緣，但父母親靠著信心，虔誠祈禱，病情奇蹟似地逐漸轉危為安，這使郭牧師娘因此更有信心，相信神將來可能會重用他。

並且比以前更加賣力地宣教和工作，每一有空就到樹下靜思，陪伴親愛的妻女，直到頭髮發白年華老去，去世之後，也葬在一起。這則淒美動人的故事深深地打動了少年惠二的心，所以在十六歲那年，他向神許願，願意為神所用，為神走過天涯海角，向所有無依無靠、落後國家的人民宣揚祂的名並彰顯祂的愛。

中學時期因過份熱愛音樂，以致荒廢了學業，被留級一年；畢業那年也沒考上大學，第二年才考上新創辦的教會學校——中原理工學院，即今中原大學的前身。小學時的尿床，早已使他失寵於父母，再加上這一連串的挫折、孤獨及自卑，他發展出很豐富的幻想力。進入大學以後，因為精於琴藝，從入學至畢業，四年的期間都擔任校園每日晨間禮拜及詩班唯一的司琴，成為校內各種音樂活動不可或缺的靈魂人物。由於朋友漸漸多了起來，強烈的自卑感慢慢得到醫治，這四年可以說是他求學生涯中最快樂

的一段時光。

大學畢業後入伍，在服兵役的一年半期間，曾有一位袍澤受影響而先後成為基督徒。服完兵役，到台北醫學院擔任助教。他在工作之餘，致力於校內基督徒團契的建立。後來在加拿大唸書時，也常寄錢回來資助團契。

加拿大

結束台北醫學院兩年的助教工作之後，便赴加拿大留學。在加拿大第一年因適應不良，被 University of Manitoba 退學，但一位與他同一研究室的同學徹夜為他祈禱，結果奇蹟似地，學校答應讓他留下來打工，渡過三個月暑假。之後，他申請到師資和設備更好的 University of Waterloo，而且還得到獎學金與生活津貼。這件事馬上傳遍台灣留學生的圈子，不管是不是基督徒都異口同聲說：「這真是神奇妙的恩典、憐憫及厚愛」。

在他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的那一年，他愛上教會詩班的一個女孩子。當時他二十歲，在教

會可琴，而她十六歲，是高一的學生。他一向害羞內向，當時的社會也相當保守，所以幾乎沒有談話及接近的機會。但勤於祈禱的他，開始向上帝祈求，希望她將來能成為他的另一半。這樣熱切地祈禱了兩年，有一天晚上，他聽到神用非常遺憾的聲音來應允她成為日後的另一半。結果神的應許在三十九年後實現，在他們各自經歷了人生的迂迴轉折之後。他在年紀稍長後，開始深思這樣的祈禱方式是否恰當？因為當時並沒有人來指導他正確的祈禱方式，所以向神求了這件事，但是否應先求神的旨意呢？如果當時先求神的旨意，是否人生的路途會平坦些？至於當年的她是名外科醫師的女兒，高中畢業後順利考上醫學院，等到他知道她的下落（考上的學校），寫情書去的時候卻碰了一鼻子灰，他嘗到前所未有的失意和信心的動搖，但他不輕言放棄，仍繼續寫了兩年的信，最後還告訴她有關神應許的事。但好像她

都沒有神的感動，因此神的應許不該成立。她日後雖然沒有回信給他，但他是否有結婚這件事卻成了她心裡的負擔。

在他加拿大留學的第二年，她因實習住在修道院的宿舍，在修女的鼓勵下，他們又開始通信，雖然只是普通的通信，談不上情書，但足以讓他欣喜若狂，雖然十年沒再見過面，但心中常幻想著她是他的女朋友。在台灣的她，美麗可愛，有許多醫師的追求，加上家裡一定要她嫁醫師，所以通信不久又不再回信了。他受到這一重大打擊，加上後來不慎，聽信媒言，和一位素未謀面的台灣小姐隔洋訂婚，等到見了面才發現彼此性格不合，於是婚事告吹。為了此事，他受到許多親友的責難，加上自責，最後精神支撐不住，患了神經衰弱症。他當時沒有錢就醫，卻屋漏偏逢連夜雨，學校要求他休學一段時間，等結婚後身心較平衡時再復學。那段期間，在台灣的父親發現罹患了癌症，而且很快

地在五個月後去世。就在這許多的挫折失敗中，他學到了堅強，使「美麗幻想者」的他變得實際了。現在看來，這些都是神要重用他的預備，使他能夠在日後獨自面對非洲艱難寂寞的宣教服務事工。因為他從神領受的任務是艱鉅的，是宣教界公認唯有單身漢才能完成的工作。事實上，他的工作所帶來的影響是超乎他和眾人所能想像的。

在加拿大八年中，前三年在 Manitoba 和 Waterloo 兩所大學專習化學，取得化學碩士學位。後幾年則在 Toronto 大學研習教育、醫事技術，以及在 Alberta 大學研習遺傳學，得到教育學士，並且取得生物、物理、化學及音樂教師之資格。

蒙呼召

大約在七〇年代之前，台灣人對非洲的了解可說是一片空白，甚至許多報導有關非洲和宣教工作的作者都沒有去過非洲，常把非洲寫成蠻荒之地，直到

1975年，陳平女士（筆名三毛）的撒哈拉沙漠的故事才第一次對非洲作了真實的報導。郭惠二先生到加拿大留學前，對第三世界的了解也是一樣空白，在加拿大開始接觸從非洲等落後國家來的留學生，發現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比他優秀，這才認清自己對第三世界的嚮往與現實之間的差距。過去的梦想破滅了，漸漸打消為神到落後地區服事的想法。

在加拿大第四年，歷經各種挫折失意後，他開始聽到神的呼召，原先就像一顆小小的種子撒在心中，然後逐漸萌芽成長。神要他到落後地區服事，但他對神說：「我沒有資格，我不夠聰明又信心薄弱。」可是神的呼召越來越強烈，心中的樹苗長成大樹，壓力越來越大。由於意識到神的呼召，他開始轉行去學習可能在第三世界用得上的學科，例如遺傳、教育及醫事技術等科目。另一方面他也急於成家，但都因他將來可能去第三世界而告吹，這讓他非常地苦悶。

在第七年，心中的壓力已讓他快喘不過氣，幾乎要窒息。為了化解心中龐大的壓力，他開始到各差會和加拿大政府援外單位申請到第三世界服務。但因他沒有神學文憑所以遭差會拒絕；不是加拿大公民，加拿大政府也不接受。最後，唯一剩下的機會是加拿大大學海外服務團（Canadian University Service Overseas，簡稱CUSO），CUSO因他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權，有可能取得公民權而接受他的申請。填志願時他填了東南亞及中南美洲，但是當時東南亞有排華風潮，中南美洲地區又需具備西班牙語能力，他無法在短期內學好西班牙語，於是被遴選派至奈及利亞。

當時西非的奈及利亞正值內戰結束，百廢待舉，但因獲勝的聯邦政府非常嫉妒打敗戰的叛軍地區受到全世界的同情與關注，就刻意限制世界各國援助人員的名額，加拿大只分配到二十個名額。所有的宣教團體在當地並不受歡迎，大約達三年之久。

在這情況下，具有多元文化背景及廣博學識的他自然成為理想人選。在接獲派至奈及利亞的通知後，他想抗拒，心中的壓力卻不斷增加。每當他到奈及利亞服事的信心動搖時，他的內心就感到非常痛苦，但若心向非洲時，心中的痛苦就會得到紓解。為解除心中壓力（事實上那是五年以來堆積在心中的痛苦壓力），他毅然決定要前往奈及利亞。

雖然他到奈及利亞服事神的決定受到許多同教會的基督徒朋友潑冷水與攔阻（說他沒有資格，因他沒有神學文憑；且歐美通常差派最優秀的宣教師及醫輔人員到最艱難之地服事神，因此能到當時世界矚目的艱難地區服務的這件事，成為一向看不起華人、同教會的基督徒們嫉妒的對象），但是慈愛的神安排一所極有傳福音負擔，又是眾多學生喜愛的多倫多小三一安立甘教會（Little Trinity Anglican Church, Toronto, Canada）的全體會友熱心地為他代禱八年。原

因是他在那時，每禮拜天上午到多倫多市內一間沒落的長老會教會教兒童主日學；晚禮拜時，則有時候到市內最大的長老會教會（Knox Presbyterian Church），有時候到小三一安立甘教會參加晚禱。因他是長老會會友，Knox Presbyterian Church 裡認識他的人很多，但主任牧師對華人非常冷漠，很少和華人握手；小三一安立甘教會的主任牧師 Harry Robinson 就不同，他對任何外國留學生和加拿大人一視同仁，從來沒有歧視，對任何人都非常和藹可親。

有一天晚上，他對 Robinson 牧師說聲再見，因為快要離開加拿大了。Robinson 牧師以為他要回國，所以請他留下地址，他留了非洲的地址。結果很有趣的，那間教會在 5 年前曾有一位年輕小姐在他非洲地址的附近地區服務幾個月，但因內戰爆發之故，不得不離開回到加拿大。內戰期間另有一位加拿大護士（學生時期在這教會作禮拜），志願去叛

軍區作戰地護士 3 年。戰爭結束後，回到加拿大，她推薦一位戰地的助理（非洲奈及利亞大學醫學院的學生），請教會資助他唸完醫學課程。他即將前往的學校就是與這位被資助的學生同一所醫學院（這位學生後來成為他的學生達一年半之久）。加拿大大學海外服務團並不是宗教團體，不可能會和小三一教會搭上線，但這樣的巧合，足以讓 Robinson 牧師和全體教友相信他就是今後小三一教會要熱心代禱之對象。

加拿大大學海外服務團

目前國內還未有類似加拿大大學海外服務團（CUSO）的團體，但先進的國家都已有類似的團體，包括非基督教國家的日本在內。在美國是政府辦的和平志工團（Peace Corps），日本也是政府辦的青年海外協力隊，英國的叫做 Volunteer Service Overseas（VSO），德國是 Diest Ubersee（DU）。加拿大的 CUSO 性質和上述各國不太一樣，它是半公半私的團體。它的經費來源

大部份是加國的援外基金，少部份由加國大企業贊助。CUSO 的活動方式是向落後地區的各國政府表示協助尋找其所需之建國人才，然後將各國所需要的人才廣告張貼在所有加拿大大學（包括社區學院）校園的佈告欄裡（各大學都有 CUSO 之支會，由教授和學生共同組成的委員會協助 CUSO 總部之工作，CUSO 總部的行政人員大都是 30 歲以下的年輕人，且都具有 5 年以上之援外經驗）。當支會收到志願者或畢業生的申請時，會先由教授、學生代表組成的委員會進行面談，以收集資料及進行背景與身份的調查；所有的資料都將送到總部以調派工作地點；而詳細的資料也影印成數份，送到調派地點，徵求接受單位的同意；待接受單位同意後，最後再告知志願被差派之當事人。由於沒有年齡限制，因此常有退休後的大學教授或護理人員之參與。

志願隊員離開加拿大之前通常需接受 2 星期的一般性行前訓

練，技術人員則要多加 2 個禮拜的行前訓練，然後按照分派的國家，分批搭乘包機前往。抵達接受單位之國家要再參加至少一週熟悉環境的講習會（技術人員多一、二個禮拜），內容包括許多參觀活動。然後才被接送到各接受單位服務 2 年（1 期），整個活動（包括所有民生問題）之經費分擔是：隊員在加拿大之行前訓練、加拿大到服務單位之來回機票（包括服務國內陸上的交通費）、2 年服務期間所有保險費及緊急狀況的處理費用，全數由 CUSO 負擔。接受單位則提供服務的薪水（一律按照當地國家政府規定之大學畢業生初薪支付，有的國家是依當地公務員的薪水標準支付），並負責住屋問題。由於不會造成接受單位太大的負擔，因此各國都相當踴躍地向 CUSO 尋找人才，但 CUSO 能答應對方的只有對方要求名額的十分之一而已。由於薪水額和生活程度與對方相等，因此工作時能避免不少麻煩，也比較容易受到認

同。每 20 到 25 名隊員，CUSO 就派有在地的協調人員（field coordinator，他們的薪水由 CUSO 支付），負責隊員和當地政府之間各種協調的問題，以及隊員各種適應的協助與事務的處理。

CUSO 要求他先取得加國國籍，不然不容易保護他，因為加國和接受他的奈及利亞國都先後在 1970、71 年承認中共，和台灣斷交。而他所持的是台灣護照，且未到達能申請加國國籍規定的居住年限；當時是永久居留必須達 5 年以上（留學期間則減半計算），才能申請加國國籍。

他一方面考慮到郵寄時間長，所以將所有能寄的東西在離開加拿大之前 4 個月寄出，工作也按規定在 3 個月前就提出離職請求，使雇主能找到適當的接替者。但是他的信心一直起起伏伏，到時候如果沒有拿到加國國籍，他就什麼都沒有了；何況教

會有那麼多人對他潑冷水或侮辱，不像別人能得到許多鼓勵，他一直很寂寞地等待時間。結果，加國的國籍是在離開多倫多到首都渥太華（Ottawa）接受行前講習的前一天通過，加國護照是隔天才拿到，他在同一天的深夜離開多倫多火車站到渥太華報到。這件事感動了不少弟兄姊妹（他們一直都用懷疑的眼光注視他，但是日後都加入爲他代禱的行列）。

在離開加拿大，臨上飛機之前，曾經幫忙他最多的朋友 John Kramer（就是在加拿大第一年，曾經爲他得到適當工作而代禱一整夜，又幫他寫信到第二所大學研究所申請入學的那一位），特地到機場歡送他去非洲。這份誠摯的友情，在他那麼寂寞的心路掙扎過程中，不但顯得彌足珍貴，更帶給他許多精神的鼓舞。